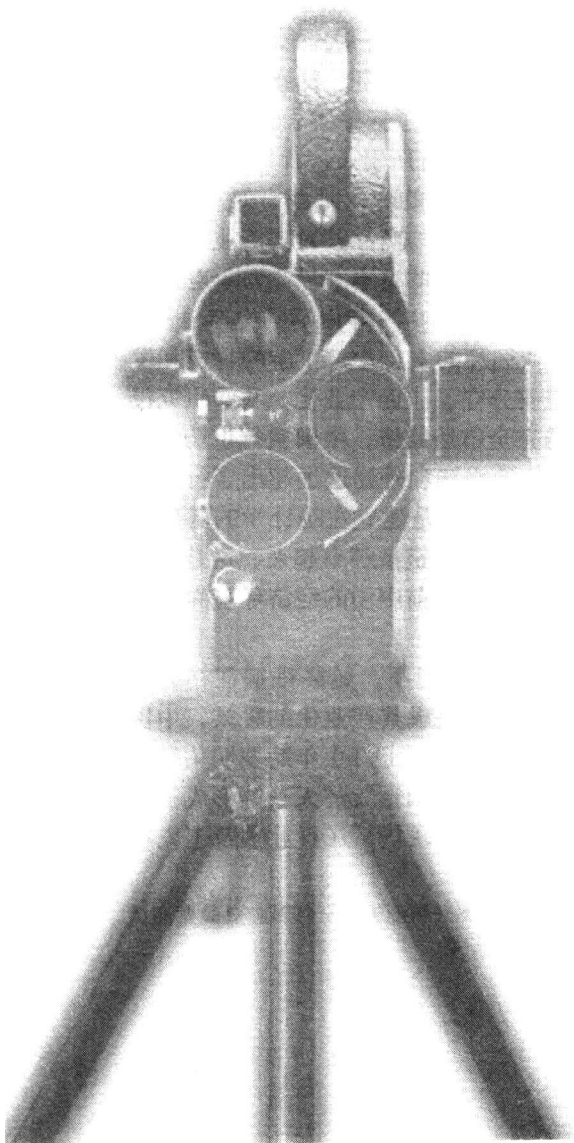


前言



选择做一部电影产业的发展史，对于我如同一次冒险，而恰恰因为如此，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一路上充满了新奇、疑惑、忐忑不安和豁然开朗……这所有的感受到最后汇总成了三个字：成就感。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产业”的解释有所出入，背景各有不同。当前的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变化时期，对“产业”一词的使用率颇高。而电影作为特殊的产品与商品，对其产业的界定有着多种的表达，尚未形成完全的统一。我的这本书只倾向于电影产业的链条，即制片——发行——放映，抑或1949年以后的生产——供应——销售，专注点集中在电影产业循环的上、中、下游的构成和发展。这样做尽管会显得保守，但是安分守己。而产业化，我的研究没有轻易涉猎，产业化的首要前提是完全市场经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才是近10年的事情。其次，产业化的内涵和外延远远超出了行业本身，它的社会辐射面要广泛得多，“产业化是建立在统计学的基础上才能够把很多的金融链条、生产链条、销售链条等串起来，这是需要大量的报表和统计才能确定的。”^①所以，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尚待成熟，产业化是产业发展的方向。

百年以来，中国电影的产业进程几经摇摆，始终徘徊在初级阶段。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好莱坞迅速完成其产业化的时候，中国的电影业也有过一次机会，经营电影院放映业已10年的罗明佑转向投资制片业，成立“联华”影业，很快与“明星”、“天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和其他两家的自产自销相比，“联华”在行业垄断上先行

① 杨步亭、王中军、何平等《跨领域交谈，冀开拓新途——电影企业经营高层研讨会纪要》载《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了一步，电影产业有了规模化的势头。这时，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九一八”、“一·二八”打断罗明佑的产业链条，随后持续了8年的抗日战争，使上海的老电影业几乎丧失殆尽。“崇洋”的罗明佑曾经将许多诸如“独立制片人”等美国电影的概念引进至中国，但是他在业内同辈人中却落下了“好大喜功”、“唱高调”的口碑。这一次是“外患”。解放以后电影产业国有化，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纯粹意义上的市场消失，但产业结构依稀尚存，产业链的循环仍在运转，经过“十七年”的倾力打造，电影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起了一个角色。十年“文革”暴风骤雨般袭来，这一次是“内忧”。因此，电影作为大投入、大产出的行业，其产业的发展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要求，一般来说，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上升期，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平稳发展阶段。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近20多年的“和平崛起”，所以现在提出产业及产业化的问题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电影产业的研究是一块处女地，学术界对它的开发刚刚起步。这本书所完成的是对百年电影产业线索的一次梳理，在这一写作中，秉承着以史实为依据，以文献为准绳，一切从史料出发，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在浩瀚的100年历史面前，个人观点实在太渺小了，我不敢任意放言，这是一个笨办法，却是老实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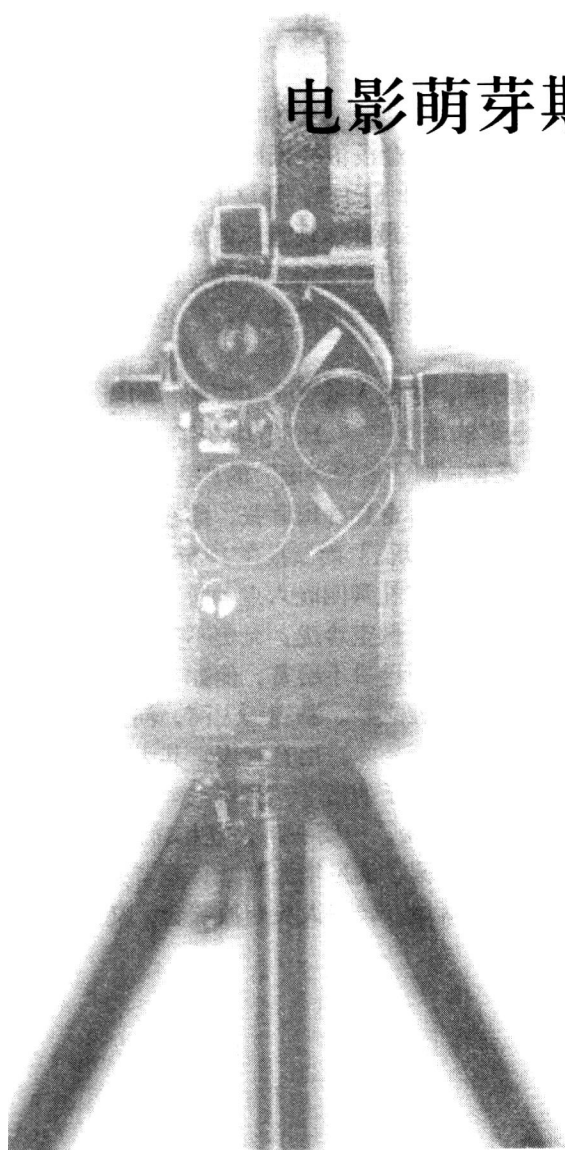
“大胆地设想，小心地求证”是胡适的一句名言，抛砖引玉，希望我的初衷和努力能够得到读者们的理解。

2005年4月

第一章

电影萌芽期的商业活动

1896—1922



一、晚清娱乐业中的影戏

19 世纪以后，西方世界开始进入工业文明，在他们的眼中大清国是一个“停滞的帝国”，然而，昔日的固若金汤最终抵御不住坚船利炮的攻势。以 1840 年为标志，中国被迫打开了门户，开放了口岸。于是，沿海，特别是开埠的上海西风东渐，在最能体现世风的娱乐业中开始有了变化。过去小农经济时的传统娱乐方式受到了冲击，西方的跑马场、戏院、舞厅和西餐馆陆续地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广为被接受。

严格地说，在电影尚未发明的时候，中国人就有了“观影”的经验。在 19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电影的前身——幻灯出现在了上海。1864 年 11 月 5 日的《上海新报》登有一则“请看洋画”的广告：“本月初八日至十五等日，在大马路四美园内有奇样外国画张，绘在玻璃面上，每日晚六点钟开门，七点钟时可以赏玩。”而该报在 1866 年 10 月 31 日的一篇观看幻灯的报道更为详细：“礼拜四晚六点钟时，在沪城同文馆内，观西士带来灯下画景数十套，掀空玲珑，无美不备。其小套如名花异卉，人物山水，奇禽异兽，固已目不暇赏，他如英国京都城池屋宇，以及冰洋凝结，更有引人入胜之妙。嗣观一大河，河上造一大桥，桥上行轮车，桥下行轮船，新奇巧妙，出人意表。其大套则见地球循日而行，星月交辉，护日护月，了如指掌。另有一画，能分昼夜，如中原日出之时，即西国日入之际，一明一暗，互相转运，而昼夜分矣。及观轮船行海，益信地体之圆，洵足增人智慧。至若人骑马上，倏忽马又骑人，并有人头忽然落地，转瞬人头归原等套，又技之小焉者也。观者无不击节称赏。”

这种新奇的观看形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渐渐地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到了1875年，上海当时著名的丹桂大戏院也放映影戏了：

“见灯光明亮倍于前夜，俄闻八音琴鸣，则幕上月洞已现无数奇葩异卉，若牡丹，若荷芙，若兰菊，皆采（彩）成五色，绚烂迷离。顷刻之间又如皓月当空，明星坠地。忽又变成一花篮，其篮内水波微动，灵妙异常，真莫测其底蕴。……种种新奇迥非昔比，座上诸客无不击节称赏。”^①

这是一则刊登在《申报》（1875年3月26日）上的《观演影戏记》，其中被细致描绘的放映效果和观看者雀跃的心情，正是影院的雏形及电影所带给人们的感受。

1885年11月21日，清人颜永京环球游历归来，为赈济两粤、山东的灾民，在上海的格致书院（格致中学）放映了幻灯片《世界集锦》，并自行解说，连演4天，引起了轰动，被当作新闻事件。据记载，虽票价贵为5角，但每次演出能容纳百人的格致书院的大堂都“观者云集，后来者至以不得容足为憾”^②，“后至者皆坐中庭芦棚下”^③，其场面可见一斑。由此，新的观赏形式和围绕它的观众群之间便酝酿出一个未来巨大的商机：电影院产生了。

二、电影传入中国，放映及影院

关于电影传入中国，有着不同的说法：首先是1927年上海中华影业年鉴社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里，程树仁在著述《中华影业史》时说：“新式影戏由洋人输入中国之时期”，“……影戏输入中国、不过二十余年、由香港以至上海、由上海以至内地”，这一史料是得到普遍认可的。1936年郑君里在他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中基本肯定了这一点，但是由香港传入除了以至上海，还有“北平，从此再转入内地”。而且，“电影输入香港的正确年代与经过，已经无可稽考。香港自一八四二年起便成英国重镇。一方面电影最初的摄影机是经英人格林（Green）之手发明于一八八八年，第一部电影亦为英人强根氏（F.Jenkins）首先完成（一八九四年），从这些事实看来，电影由香

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45—246页。

② 《重演影戏》载《申报》1885年11月28日。

③ 《观影戏后记》载《申报》1885年11月25日。

港转入中国的见解，是相当可靠的。”权威的香港电影史料说明，香港的电影放映比上海的首映日还要早半年，是中国最早的。^①再者，有观点认为电影是从法国传入的。解放后，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是这样记述的：“1896年初，卢米埃尔雇用了二十多个助手，经过训练，分别派到世界各地去放映他的影片，……在两年之内，‘他的观众遍布于五大洲’。这样，中国、印度和日本就都在1896年先后有了电影的放映。”虽也有人持否定意见，指出卢米埃尔的助手到过印度的孟买，没到过中国。卢米埃尔没有记载派往中国的摄影师的名字，他的目录里也找不到在中国拍摄的记录。但是，这一说法在香港方面得到了证实。^②

有很多史料都证明，中国电影的发展与世界电影的诞生几乎是同步的，而且是从商业放映活动开始的。就如郑君里所言：“当时的电影商业，亦和早期的京剧一样，附属于茶院里面。”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10日——14日上海《申报》副刊的广告栏中，刊登了在上海苏州河北的西唐家弄（今天潼路814弄35支弄）徐园的“又一村”，西方商人放映“西洋影戏”的广告，这是中国的第一次电影放映，也说明距卢米埃尔兄弟于1895年12月28日这一重大发明后最迟8个月它就显身上海了。《申报》上的广告是首则电影广告，其中所云的“初三”是阳历8月11日，现摘录如下：

园 徐

欽 候 虎 文 設 仍 夜 三初

法戏串客戏影洋西

火焰光电巧奇样新造定

五	哪	螯	玉	火	蛤	水秦
彩	吒	鱼	堂	樹	蜊	漫淮
遮	斗	化	富	银	斗	金画
灯	宝	龙	贵	花	法	山舫

兴	以	芳	奇	玩	名	内	君	同	乞初
预	助	谱	花	异	稀	附	在	好	爱
白	雅	曲	群	果	古	设	园	诸	蒙

角二位每资游

①②余慕云《香港电影掌故》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5年出版。

1898年5月20日在上海《趣报》上发表的《徐园纪游叙》一文，提供了徐园放映的纪录短片目录：“……堂上烛灭，方演影戏。第一出为《马房失火》，第二为《足踏行车》，第三为《倒行斛斗》，第四为《酒家沽饮》，第五为《广道驰车》，第六为《瞻礼教堂》，第七为《左右亲嘴》，第八为《春度玉门》，第九为《扑地寻欢》，第十为《空场试马》，第十一为《水池浴戏》，第十二为《造铁击车》，第十三为《执棍腾空》，第十四为《秋千弄枝》。以上各出，人物活动，惟妙惟肖，瞩目者皆以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也。”^①徐园的首次放映是将影片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游艺杂耍节目里的，此后，延续放映了几年，多为法国影片。徐园的原址早在1900年左右因拓宽马路而拆除了。

自1896年后，上海的流动电影放映一般都是由西方人来经营，场所在茶馆、酒楼里另辟单间，或在公园搞夜间放映，另售门票。最早的露天电影放映场所是处于南市的西园和新园，在夏天，这种娱乐和消暑合一的活动吸引了观众。不久便出现了专营此业的电影放映商：美国人雍松1897年7月来到了上海，先后于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二马路（今九江路）、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的天华茶楼、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在公共租界天华茶楼的放映连演10余天，售票价格为头等5角，二等4角，三等2角，四等1角，按清政府“制钱”与银元的兑换比率，票价很贵。这一年的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第74号上，刊登了一篇《观美国影戏记》的文章，它详细记载了8月间雍松在奇园放映的内容：“……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新凉，偕友人往奇园观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又一为美国之马路，电灯高烛，马车来往如游龙，道旁行人纷纷如织，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洵奇观也！观毕，因叹曰：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如蜃楼海市，与过影何以异？自电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穹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

① 《上海电影志》，《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611—612页。

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乍隐乍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这篇对影像的观感，权可作中国影评的第一篇。另外，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于1899年也来到上海，先在四马路升平茶楼、乍浦路跑冰场和湖北路金谷香番菜馆放映。后因片源陈旧，营业不善，就将放映机及胶片等全部转让给他的朋友西班牙人安东尼奥·雷玛斯(A. Ramos)。1903年，雷玛斯接手放映业务以后，开始仍在乍浦路跑冰场内放映，后迁至大马路的一间粤商茶院同安茶居内，“茶资（即票价）高涨至五角，由雷氏与院主共分。……当时因售价过高，又无新片为继，演期仅及二星期而止。”^①再后又迁往四马路的青莲阁（茶院，原在福建路东面，后迁移）。雷玛斯极善经营，在上面是茶馆，下面是娱乐场和商场的青莲阁租一间房，挂起一张白布做银幕，雇佣了几个穿得红红绿绿的印度人（也有一说是中国人）在大门口洋鼓洋号，吹吹打打，并且时常撩起门帘露出白幕，招徕路人。“当时海上娱乐事业，并没有现在发达，张园愚园以外，在中心地点而最为人所注意的便是青莲阁。内地人士到了上海，不到青莲阁算是件羞耻的事情，加之中国人为好奇心所动，也很情愿挖出几个铜元去见识见识外洋新到的活动画片。虽然是时间只要十五分钟，片子大多是破碎不全，看的人已经很是很满意，营业因此发达。”^②雷氏的这个青莲阁放映点是上海的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

与此同时，据1900年2月20日的《华宇日报》这份当地有史可查的最早电影放映记录看，其首映地点在香港的上环大安台的重庆戏院”^③；和香港一样，由于中法战争，开放通商口岸后，广西也较早地接触到了电影。台北从1901年出现了一些临时的电影放映点。就连中国的南疆边镇龙州，1903年法国领事馆举办过小型的电影放映活动^④；而作为京城的北京，由于其地位显赫，电影在这里既流于市井又造访过皇宫。1902年，北京的商业街道连电灯都尚未安装，一个不知名的外国人带了影片、放映机、发光器，租借在前门外打磨厂的福寿堂放映。内容均为《黑人吃西瓜》、《脚踏赛跑车》、《美人首旋转和

① 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载《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出版。

② 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载《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出版。

③ 柯可《中国岭南影视艺术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5页。

④ 柯可《中国岭南影视艺术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5页。

微笑或者花衣作蝴蝶舞》、《马由墙壁直上房顶》等短片。第二年，又有一中国商人林祝三自欧美归来，携带放映机和影片也在前门外打磨厂借天乐茶园放映，这是中国人自己运外国影片在国内从事电影放映的开始。而在清廷皇宫，1904年慈禧太后庆祝70寿辰，英国驻北京公使厄恩斯特·梅逊·萨特爵士进献了电影放映机一台和影片数套，在宫内放映时，仅放了三本，摩电机发生了炸裂，慈禧认为是不祥之兆，从此宫里不准再放映，并令随去的放映师叶荣廷（清时三善水会扳头，京师电灯公司技师，后为北京第一代电影放映技师，门下有许多徒弟）三日不得进食，撵出宫去。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其中之一端方带回一台电影放映机。翌年，宴请载泽时以“演电影自娱”，还令“何朝桦作通判说明”（解说）。不料中途又发生了爆炸，何朝桦等人被炸死，也被看作是不吉利，以至于在远离朝野的江浙尽管1908年就已经有了日本租界放“天下第一活动电光影戏”的广告，但到了1909年浙江警察局和巡警道却仍有“电影有涉危险，未便轻视”的禁令及《取缔规则》中“不得租借外国人机器影片”的规定。^①虽然政令挡不住潮流，慈禧太后也曾在1906年为笼络人心，违背两年前的话送了一台放映机和数套胶片给世居定远营的宁夏塔王布希格，以供享用。^②然而，新兴的电影与保守的中国朝廷之间缘分并不大，它反而在民间有着丰厚的土壤和勃勃生机。

1905年6月16日，天津《大公报》在刊登英商快利洋行的题为“活动电光影戏出售”的广告中首次使用了“电影”一词：“兹由外洋运到新式电影机器一副，并影片六十余套，其景致异常可观，兼有游戏影片甚多，见者莫不捧腹……”。电影的放映到了这一时期已经发展得势不可挡了，市场的需求和良好的经济效益使很多专营此道的人，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都约而同地看到了这一点。首先在天津1906年12月8日，美国电影商人租用法租界内的权仙茶园（今滨江道与吉林路交叉口）放映电影，不久更名为“权仙电戏院”，它是天津的第一家，也是有记载的全国首家电影院。随后1907年，北京东长安街北，开办了由外商经营专为外国人放电影的电影院——平安电影公司，开始放映有情节的侦探片、滑稽片，这在当时清光绪三十三年

费静波主编《浙江电影纪事》（1908—1990），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页。

李庆跃《宁夏电影史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年的《顺天时报》上有所记载。随后，前门大栅栏的大亨轩后改名大观楼，每晚电影满座。所放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片外，只有戏法和西洋风景。北京西单牌楼西单市场的文明茶园，前门外小椿树胡同路西的“平顺电影”，前门外大栅栏的庆乐园，也先后放映了电影。到了第二年，影院的数量仍在不断地增加，同样是前门外大栅栏又开了三庆园的“开明电影”，东安市场二月开了吉祥园。此后，西城护国寺街的和声园，西单口袋胡同的新丰园，西四西安市场的西庆轩茶园，都相继放映了电影。^①虽然同一年，香港中环也出现了外商办的“比照”、“域多利”电影院和港人李璋、李琪办的“香港影画戏院”。^②但真正能和北京形成一南一北局面的是上海，雷玛斯在青莲阁之后又有了幻仙戏院，据周剑云和谷剑尘的记述都是“跑马厅用芦席棚搭盖的”，“在幻仙时代已有长片侦探片输入。新闻片和风景片不过附属映演而已。幻仙时代的票价起码要一角小洋，那时已经算得很贵了”（谷剑尘）。郑君里对此的看法是独特的，他认为“……幻仙戏院（在西藏路），从几点看来与美国的‘五分钱戏院’相似：它已经脱离茶园而开始具备一种独立的商业底规模，开映的节目也就是《火车大劫案》一类的侦探短片；而且，它又是日后大规模电影事业的发展之资本积累的根源”。雷玛斯果然在1908年租赁了乍浦路海宁路口的溜冰场，用铁皮搭建一座简陋的房子，能容纳250个座位，取名“虹口活动影戏院”人称“铁皮房子”。当时的地址门牌是乍浦路112号。1908年12月22日开幕，首映西片《龙巢》，一时观者如潮，这是上海第一家正式的电影院。这家影院不久进行了改建，改为钢筋混凝土砖木结构，座位增加到710只。1913年由日本人租赁经营，改名为东京活动影戏园。1915年5月1日又将原名改了回来，1919年后改为虹口大戏院。经《上海电影志》统计，早期上海的电影院大都是外国人投资经营的，而且比较集中在虹口一带，雷氏新建虹口活动影戏园后，1909年又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海宁路口24号新建维多利亚影戏园，装饰富丽，内设豪华酒吧。1910年由葡籍俄国人郝思倍S.G. Hertzberg在北四川路52号开设爱普庐活动影戏园；专门出租影片的英商林发在海宁路江西北路口开设了爱伦活动影戏院；1914年雷玛斯

① 田静清编著，杨海波校正《北京电影业史迹》（1900—1949），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0页。

② 汪流主编《中外影视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32页。

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再建夏令配克影戏馆；同年，日本商人在虹口东武昌路 4 号开设东和活动影戏园。1915 年西班牙人古藤倍（B. Goldenberg）则在南市方浜桥新建共和影戏院（今为中华影剧院）。1917 年，在中国从事过拍片的意大利人劳罗（A. E. Louros）将四川北路虬江路口原粤商曾焕堂修建的福建大戏院改为上海大戏院，也放映电影。而雷玛斯在这一年又在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 367 号）建起了万国大戏院，在原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新闻路口）新建了卡德影戏院。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现了 10 座影戏院。

在这一时期，雷玛斯是一位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他与雍松等人不仅在将现代文明产物——电影传入中国，与普通百姓亲密接触的进程中起到了先行作用，与此同时，还把电影作为娱乐业的产业概念通过他们的经营确立了起来。当时，在虹口北四川路海宁路周围，先后有维多利亚、爱普庐、爱伦、上海和原虹口、东和等外国影戏院，一时竞争十分激烈，对雷氏的维多利亚形成夹击包围之势，营业受到影响。因此雷玛斯经过缜密的考察，决定在静安寺建夏令配克、在中虹桥建万国，在卡德路新辟卡德，使其从事的电影放映业在上海称雄一时，组成雷玛斯游艺公司。至 1921 雷玛斯又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 85 号）建成恩派亚影戏馆（今嵩山电影院）。再加上原来的虹口和汉口的九重，于是雷氏游艺公司旗下已经有了 7 家电影院，而其中的夏令配克影戏园（今新华电影院）是最值得一提的，它存在的时间长达 80 年（1994 年才拆除），地理上具有充分的优势，是建在上海中区的第一家影院，1914 年 9 月 8 日开幕时，规模堪称第一，装潢时髦华丽。经营上也独到，以放西片为主，在中国国产影片崛起之时也提供了机会。后来有声片诞生，夏令配克又第一个改造安装有声放映机。这样，雷玛斯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直至 1926 年他离沪回国，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郑君里在以后评价雷氏所控制的上海半数影院时认为，“这就形成有利于外片在华发展之最初的一个大规模的连环影院”。

与上海的洋化相比，北京的影院要本土化得多却并不逊色。据《北京电影业史迹》一书的考证，概况如下：1910 年 12 月平安电影公司停演扩建，第二年 7 月改名为兴利平安电影公司（现儿童影院）重新开业，由英籍印度商人巴立（译音）经营；1913 年前门外大栅栏大观楼电影园正式开业；1916 年华北电影公司又在东长安街老北京饭店开设了北京电影园；1917 年 6 月，中央公园、公安电影院相继开业；

1918年2月前门外香厂路新世界电影场开业，“新世界是仿照上海大世界的形式兴建的”，是北京最早的多功能游艺场，从一楼到五楼集戏院、杂耍场、商场、菜馆、茶楼、照相馆、屋顶花园和咖啡馆等于一体，“二层楼：东首电影场，本游乐场不惜巨资，自运外洋各种新片，京津均未演过，如新电奇异事以及各种游戏变幻，精奇能令阅者如身临其境，与他家大不相同”；1918年3月城南游艺园电影场建成，“由北洋政府时期曾任督军的李准（时称李军门）投资，经理是广东人彭秀康。城南游艺园位于现在的友谊医院一带，占地面积约两万平方米”。同年7月，前门外香厂路东方饭店屋顶花园电影场开业；1919年真光电影剧场在东安门外大街南的总院新址开始兴建，1921年10月落成，它按照当时国际流行的设计，罗马式建筑，规模大而豪华，座位舒适，设备齐全（自备发电机、盥洗室和西式厕所、冷热水管），冬夏均设抽气机保持空气流通。北京《晨报》有记载：“东安门大街，真光电影总院，因工程伟大之故，虽加工赶建，尚未竣工，不得不延数日，诸国之戏院，亦不多观，而办事之设施适合我国之社会，且本院之设原为社会之进步”。作为首屈一指的影院，真光对观众有着严格的公德要求，选片标准较高，观者多为知识阶层，票价也比别处贵。1920年2月和1921年5月真光的另两家分院——由东安市场内丹桂戏园改建的真光电影院、中央公园的真光电影分院也相继开业；1921年开业的还有2月的开明电影院（东安市场内吉祥园改建），6月东四牌楼隆福寺景泰茶园改造的隆福寺电影院。也在这一年建成的西城绒线胡同西口内路南的中天电影台，到了1923年7月1日停业，一个月以后在西长安牌楼南、北新华街北头路西租得三亩多空地，搭盖凉棚，落成中天电影花园，8月1日开幕，1至4日首映世界名著《卢宫秘史》共10大本。至此，北京的电影院大大小小，前前后后已迅速发展到了二十家。当时的电影院沿用了老戏园的规矩实行男女分座，有的女散座设在楼上，男散座在楼下。也有的用木栏杆将男女观众的座位分开，只有包厢允许眷属同座。关于戏资（票价），依据电影院的条件、影片好坏及放映场次而定，按包厢、优等、头等、二等、三等进行收费，有固定价格，也会调整浮动。较大的影院实行先期售票或预定票的办法，除少数几家大影院外，一般不实行对号入座。

到了上世纪20年代初电影已经从新鲜的舶来品变成流行时尚，几乎在全国称得上城市的地方都有电影院出现。郑逸梅在他的《影坛旧闻》中描绘过在北京看滑稽戏的感受：“……这闯祸者做出许多丑怪

乞怜相，观众为之哈哈大笑，认为很是滑稽，带着满意的心情离场而去。”而作家秦瘦鸥则记述了家乡嘉定县城放映电影的情况：“……在一间普通的平房里面，最远处高挂着一大幅白布，中间就是两行横行的条凳。……机声轧轧中，后面射来一道白光，布幔上面立即出现了山水、树木、房屋、车船、人物等等，有活动的，也有不动的。”^①由此可见电影的普及，它的印迹不仅留在了普罗大众的记忆里，也存于文人墨客的笔端。在1911年的6月，慈禧太后死后，清朝已是宣统三年。上海城“自治公所”公布了“取缔影戏场条例”，凡七条规定：“开设电光影戏场，需报领执照”；“男女必须分座”；“不得有淫褻之影片”；“停场时刻，至迟以夜间十二点钟为限”如违犯“，经查察属实者，将执照吊销，分别惩罚”，这一条例成为中国电影检查制度的雏形，民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厅”依然沿用了它。^②清廷对此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说明电影的放映已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行业，与一些电影的发明国或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电影业在中国发端于放映，而后带动了拍摄制作，两者结合共同构成了电影产业的发展。

三、从“被拍”到“自己拍” ——《定军山》的诞生

在中国人自己拍摄电影之前，已经不止一次地被外国人摄入了镜头。李鸿章便以其身份的特殊成为了第一位“明星”，1896年5月，这位钦差大臣起程出访，经过欧洲后于8月28日抵达美国，受到了总统等高级官员的欢迎。美国缪托斯柯甫电影公司把其在纽约的活动拍成短片《李鸿章在格伦特墓地》、《李鸿章乘车过第四号街和百老汇》。这只是电影发明以后半年的事。

1897年，美国爱迪生电影公司派出摄影师詹姆斯·里卡尔顿前往印度、中国，先后到达我国被割让的殖民地香港、澳门，内地的广州、上海，拍摄当地风光、见闻。事隔一年后将这些素材编辑成《香港码头》、《香港商团》、《香港总督府》、《香港街景》、《澳门河景》、《广州码头》、《广州船载中国旅客登岸》、《上海警察》、《上海街景》等多部

汪流主编《中外影视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32页。

②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1页。

纪录短片发行放映，有说法这些影片现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①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一时激起了外国人来华拍摄纪录片的兴趣。一位不知姓名的外国摄影师拍摄了被俘义和团团员遭处决的场面；英国两名摄影师纪录了许多关于义和团的素材并编成英国传教士遭到义和团袭击，后被英步兵营救的《袭击教会》；而曾在卢米埃尔公司担任过摄影师的英国人詹姆斯·威廉逊也将纪录片素材，与演员表演合成一部短片《中国教会被袭记》，据说有对前一部片子模仿的痕迹；另外，日本东京经营彩色版画的吉泽商店派出照相师柴田常吉、深谷驹吉为特派员到北京拍摄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义和团事件》一片，共16本，是公开放映最早的日本新闻纪录片^②。

这一时期美国的摄影师也陆续地来到了中国，在华域克公司1901年4月的目录上，有战地摄影师约瑟夫·罗森陶的一部《上海南京路》的短片，内容是：“这是一条拥挤的街道，影片中出现行人、黄包车、轿子、一名骑脚踏车的洋女子，一队锡克教教徒和两个德国军官。”但他由南非到达北京所拍的“我见到整个地方被毁坏，紫禁城惨遭蹂躏”的素材不知去向；另外还有几位美国人同样拍摄到了平定“义和团”后的北京，其中一位皮顿·霍姆斯拍的北京风景是罕见的早期皇城的纪录片^③。而后，美国缪托斯柯甫一比沃格拉夫公司拍摄的《李鸿章》（《北京紫禁城》）是在北京夏宫（颐和园）李鸿章与八国联军首脑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情形。另还有《北京前门》、《天津街景》、《火车抵达天津站》等短片发行放映。

近邻日本也是早期进入中国拍摄的国家之一，1901年日本放映主高松丰次郎在台湾巡回放映从日本带来的十多部影片的同时，又奉日驻台湾总督之命拍摄台湾风光片以歌颂其在台统治，共2万英尺。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英摄影师罗森塔尔随日军到东北拍摄新闻片，并于次年4月20日在伦敦日本公使馆内放映。法国百代公司派摄影师P.柯布索夫拍摄了新闻短片《处决红胡子》（《处决李同》）日本东京吉泽商店、广目屋等机构也派人随军拍摄。

再后来仍有记载：意大利人劳罗1907年来沪，先经营影片放映，后购置一架爱脑门牌木壳摄影机进行拍片活动。先后有《上海第一辆

① 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0页。

② [日]岩崎昶《日本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③ [美]陈立《电影萌芽阶段》（1896—1911），载《中国电影研究》第1辑，香港中国电影学会1983年12月出版，第91页。

电车行驶》、《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上海租界各处风景》和《强行剪辫》等。定居后其收购影院（1917年），并出租摄影棚。1909年法国百代公司还在北京广德楼戏园拍摄过著名武生杨小楼的《金钱豹》和何佩亭的《火判官》等剧片段，曾在西城新丰市场（口袋胡同）的和声戏园、天乐园等处放映。

外国人镜头里的中国和中国人是带有其主观色彩的、不全面的，甚至带有偏见和不真实，它所表达的西方人观点长期以来给中国的形象定了格。但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而言则起到了积极的刺激作用，经过了十年的耳濡目染，中国人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电影实践。

1905年，中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在与电影亲缘关系最近的照相业显身了。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字景丰，1850年生，沈阳人）早年在一家照相馆里当伙计，后自费到日本学习照相技术，他1892年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开设的丰泰照相馆是当时京城颇为著名的一家，生意兴隆，规模也日渐扩大，拥有照相技师和学徒十余人，还兼营照相器材。据说任庆泰曾多次应召为王公们拍照，被慈禧赏赐四品顶戴。除此之外，任庆泰更是位实业家，盛年时，他投资创办过“保和堂”、“庆馀堂”、“老德记”等几家中西药房和桌椅木器店、汽水厂。最值得一提的是任庆泰经营的“大观楼”，由他投资的商场中的一间娱乐场所（有可能是“大亨轩”）改建，是当时一家较早放映电影的固定点，1907年改造为茶楼式的“影戏园”。1909年的一场大火使之破产，只得停止拍片，典当其他产业，只剩下大观楼影戏园，1913年“大观楼”再次开业，改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电影院正是任庆泰苦心经营的结果。而1927年1月重新开张的“大观楼”已经易手，与他没有关系了。正是由于经营电影放映，任庆泰时感片源乏味且不足，萌生了将“静照”拍成“活动照片”的想法，于是，他便到东交民巷德国人开的祁罗孚洋行购得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一架、胶片14卷，开始准备。身处商界的任庆泰广结社会名流，尤其与梨园人士过从甚密，照相馆的橱窗里也常摆些名角的戏照。因此，他的第一次拍摄目标便选择了国粹京剧，著名老生“谭派”创始人谭鑫培的代表作《定军山》，有记载说这年“上半年的一天”，在丰泰照相馆中院天庭，挂上白幔，利用日光，由该馆最好的摄影师刘仲伦掌机。机器一转起来，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拍停停，前后共三天，拍摄下谭鑫培表演的“请缨”、“舞刀”、“交锋”三个片段，共完成了三本。当时正值谭鑫培的60诞辰，据说稍后他还拍摄过《长坂坡》中的片段。